

# 茶业经济与近代祁门社会变迁

康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晚清民国时期, 祁门商人普遍经营茶叶贸易, 茶业经济盛况空前。随着茶业经济的兴盛, 祁门县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 加快了社会变迁的步伐。茶叶贸易的兴盛, 促使一些村镇兴起; 也引起了县域境内人们的服饰、村落建筑和民居建筑向实用化演变等社会生活的变化; 茶农在生产实践中还创造出了采茶歌、采茶戏等艺术形式, 这些民间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20世纪40年代后, 随着茶叶贸易的衰落, 祁门县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 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延缓, 乃至趋于停滞。

[关键词] 近代; 茶业经济; 祁门县; 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 外国经济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中国内地各个地区, 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的茶叶外销兴盛, 徽州作为重要产茶区域, 其茶叶出口在整个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徽商此时也迎合了世界市场的需要, 创立了“祁红”、“屯绿”等新的茶叶品牌, 从而为徽州茶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而光绪年间创立的新型茶叶品种——祁门红茶作为华茶出口的大宗贸易, 也获得的很大发展, 长期在世界红茶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晚清民国时期, 祁门商人普遍经营茶叶贸易, 茶业经济盛况空前。由祁门茶叶外销兴盛, 茶业成为祁门县的经济支柱, 祁门茶商活跃与汉口、上海等全国重要茶叶商埠, 在当时的茶叶行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茶商们在将家乡茶叶源源不断的运送到通商口岸销售的同时, 又将那些大城市新兴的思想、文化、习俗和洋货等带到故里, 引起了祁门乡村社会风貌的变迁, 使得穷乡僻壤的祁门乡村社会也积极进入了近代社会转型时

期。但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 随着茶业经济的衰落, 祁门近代社会变迁的步伐开始减缓下来。在某种程度上说, 茶业经济是研究近代祁门社会变迁的一把钥匙。

## 一、茶业经济与祁门村镇的变迁

茶业经济带动了祁门乡村社会的变迁。祁门县城的三里街位于阊江河畔, 在以水运为主的年代里, 三里街不仅是祁门茶叶运往九江等地的重要码头, 也是徽州绿茶“漂广东”的重要中转站, 成为茶叶重要集散地, 茶商多在此雇船将茶叶运往各大商埠, 那时三里街商业盛极一时。其经济地位后来随着水运的衰落而下降, 在公路运输兴起之后, 茶叶外运不再经过此地集散。

祁门四乡的茶叶产地, 由于茶叶贸易的兴起, 在各自的范围内形成了各具规模的茶叶集散地, 促进了一些村落的兴起。西南两乡是祁门茶叶主产区, 因此, 因茶叶而兴起

的村落多集中在这两乡。南乡芦溪、溶口和平里是祁红的主要出产地，且都位于闽江上，因而成为南乡各地茶叶的集散地，每到茶季茶商多在此三地开设茶号收购毛茶，并精制秤精茶，然后顺江而下运往各大商埠销售。店铺滩则是安茶的主要产地，安茶茶号多集中于此，安茶第一品牌孙义顺茶号就处于此地。南乡的倒湖“当大洪水与大北水合流处，与浮梁接壤，为水道出境之咽喉，厘卡亦驻在此”。<sup>[1]</sup>故商业因之而盛，成为祁门最大的市镇之一。“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浔、汉、沪港等处”。<sup>[2]P601</sup>西乡的历口、闪里和高塘也是红茶的主要产地，三地分别位于文闪河、新安河和大北河上，可通过便利的水运直下江西，因此成为周边茶叶的重要集散地，茶叶贸易盛极一时。此外，祁门县茶号的分布也主要集中于以上各地，也说明这些村落有较大的产业凝聚力。

茶业经济的兴盛还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茶叶包装需要大量的竹篾，而祁门“安茶之篓、红茶之箱，亦取资境内”<sup>[1]</sup>，因此促进了篾篓业的发展。茶叶制成后需要装箱，“红茶箱名曰二五箱，全系枫木制造”<sup>[3]</sup>，而“祁门一带，山地甚多，枫香于山麓间见之，山腰多杉，山顶多松”<sup>[4]</sup>，这就极大地满足了茶叶木箱的需要，因而促进了祁门箱栈业的发展。此外，南乡栗树坦、董家湾、溶口、芦溪等处利用靠近闽江水运的区位优势，小船和竹排，以转运茶叶，进而也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同时，这也解决一南乡闽江沿岸众多农民的就业问题。

## 二、茶业经济与祁门社会生活的变迁

祁门茶商足迹遍及各大商埠，在长年的奔波中，他们开阔了眼界，将大城市的各种新思想、习俗、服饰、洋货等带回故里，使

得祁门县人们的风俗民情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因邮局等现代通讯的开办，使穷乡僻壤的祁门与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加快了祁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社会变迁。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陶甓公牍》一书对祁门县相关社会生活的变迁，有着详细的描述。

### （一）报刊、邮局和洋货

晚清时期，由于茶叶的兴盛，祁门人外出贩茶的风气日盛，上海是祁门人麇集之区，故上海的新闻界对祁门的影响也较大。对此，《祁门民情之习惯》记载：祁虽山邑，向喜阅京报阁钞，自沪上报馆接踵而起，购阅者亦渐多，就所查悉者，除县学两署及城乡各学堂外，城内销报 14 家；东乡浒溪销报 2 家，南乡平里鱣等处销报 6 家，西乡历口、闪里等处销报 4 家，北乡善和等处销报 2 家。<sup>[2]P602</sup>商业信息的传递对商人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晚清由于商人的推动，使得地处山区的祁门也出现了邮局，对此，《祁门县乡土地理志》指出：“祁门向无信局，欲寄信件货物等，需雇人专信，或托各店铺代寄，人多苦之。光绪丙午（1906 年）始设邮局于城内，与各属之邮局交通。凡信件各物，粘票投局，任寄何地，均照投递，至便也。”<sup>[1]</sup>邮局这一现代通讯媒体的出现，在加强商业通讯的同时，也极大地加快了祁门与外界的联系。随着邮局的开办，祁门人通过邮局订阅报刊的现象日益增多。在近代报刊、邮局等外来传媒的冲击下，外来洋货的倾销力度不断加大。加上，祁门当地土货未能改良，传统工艺的日趋没落，更为洋货的大量涌入创造了机会。而洋货的引入，使得质朴的民风发生变化，人们的生活日趋浮华。祁门前代的县志对当地人家的生活记载多为，“家居务俭蓄，茹淡操作，日再食食惟饘粥，客至不为黍，不蓄乘马，不蓄鸬鹚，贫窶数月不见鱼肉，此昔日之俭约也。”而到了晚清时期，则“民风稍奢，喜用洋

货，惟城一都为最，西南两乡茶业最盛；北乡无大宗出产，而好尚亦喜新奇。”<sup>[2]P601</sup>洋货的冲击，使得祁门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 （二）服饰

祁门虽处万山之中，但由于商人来往奔波，他们将外来新式服饰带入了家乡，从而使得传统服饰受到了洋货的巨大冲击。祁门绅士方振均在《祁门风俗之习惯》中，对祁门男女服饰之嬗变有着具体的描述：“祁俗向称俭朴，男子长衫多客布，棉袍多灰色，马褂外套多以青布、天青呢、布呢为之。但是到了晚清，则是：“渐见繁华，各色客布、洋布销售颇多，宁绸线、关官纱间亦用之。”但是不同阶层的服饰变化程度存在这很大差异。“乡村农民只知用本地土布而已，妇女衣服纯用布制，冬裘、夏葛不多见”，而“缙绅之家较为华丽。”<sup>[2]P604</sup>由此可见，贫苦的乡村妇女的服饰几乎没有多大变化，而家庭殷实的缙绅之家的服饰则日趋华丽。祁门乡俗的变化于此可见一斑。祁门男女服饰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商人和学生的影响。尤其是由茶商捐资兴办的新式学堂中的学生，他们多接受新式学问，学习外国知识。晚清时期，祁门风气渐开，“官宦子弟，好学英文、英语，亦有习东洋语言文字者。”<sup>[2]P605</sup>这些接受新学问的学生更为推崇新服饰，从而对服饰的变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 （三）村落建筑

徽州民居是中国古代最有特色的民居样式之一。其主要以粉墙、黛瓦和跌宕起伏的码头墙为主要标志，形成了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和谐的靓丽风景。然而到了晚清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徽州民居的建筑形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具体到祁门，由于茶业经济的兴起，民居建筑形式有着重要变化。近代以前，祁门四乡楼房：

厚以垣墉，高以梁栋，不事雕饰，间有油漆以壮观者。民房多三间，亦有四会，各式门前筑园院，出入通行皆石板……旧建民房天井狭窄，光线黑暗。

晚清时期，房屋建筑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士大夫之家，未有不高大门闾，明窗净几者。东乡双溪诸村，多名家大族居处，与城关相似，家藏器具有留传至数百年者。南乡厚潭地近江右，舟楫易通，第宅相连，大有广厦万间之象。西乡历口近日业茶获利者，屋宇亦多壮丽。其余农家者流开门见山，终日荷锄田亩，有客问津此地水尽山穷，又有柳暗花明之处。<sup>[2]P603</sup>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祁门茶业经济的兴盛促使了祁门乡村民居建筑形式的变化，其变化的趋势则是从过去那种光线黑暗的不适住居的建筑形式，向更为实用的形式转变。

## （四）宗教和民间信仰

徽州各地宗教皆以朱熹儒学之礼教为正统。祁门亦是如此，“大抵以紫阳为宗，至道士飞昇释氏轮回之说，皆为儒者所不信。回教向不经见”。但到了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祁门也出现了西天主教和基督教，此两教势力的消长，经历了一个动态过程。即是“天主、耶稣两教，咸同以来，入教者，甚属寥寥。”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间，教风最盛，而翌年后，“教风渐杀，彼此往来渐间融洽。”<sup>[2]P605</sup>尽管外来宗教势力远远不及本土传统儒教，但西方宗教作为新生的外来宗教，或多或少的对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与外来宗教相比，祁门本土的民间信仰则更为活跃。祁门地方最重神道，如“岳帝、祖师、地藏、五显和土地，无不有会。”<sup>[2]P605</sup>晚清民间迎神赛会往往以祁门当地的民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民俗风

情。如每年谷雨前后，祁门乡民“采茶立夏日造夏糲，新妇母氏馈送浴佛，日造乌饭相馈……七月中元节，祀祖，设盂兰会。遇天旱，乡民戴柳，钲鼓喧哗，祈雨于坛，闰年演目连戏。”<sup>[2]P604</sup>民间信仰活动往往对地方社会有较大的冲击，迎神赛会过程中演戏与赌博伴随其中，对地势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官府屡次加以禁止。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各种批文中，多次指出迎神赛会之荒谬。他曾作《禁赛灯示》：“顷闻岩镇，定期赛灯，哄动隐民，啸聚飞腾。花钱惹祸，是可哀矜，恃众故违，尤属不应。何人为首，城社是凭，按名提案，尽法严惩。特再告诫，其各兢兢，姑息养奸，本府不能。”然而官府三令五申的禁令，似乎并未能奏效。祁门民众依旧是“每遇疾病，诚心祈祀”。<sup>[2]P605</sup>这与民智未开有关。

以上我们介绍了近代祁门因茶业经济兴盛，给祁门乡村社会带来的社会生活在通讯、服饰、建筑和宗教等方面的变迁。然而，祁门四乡民众在职业趋重上的不同，大体言之：“祁门进城一都，大半经商赣、浙、沪、汉诸地。东乡向分内外，类营商在外，又游宦者多。南乡、西乡民情最古。北乡农家者流只知稼穡，不务诗书，近有不避险阻，远游万里之外者。”<sup>[2]P601</sup>加上，祁门境内茶叶分布的不平衡，四乡茶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各异，这就造成了祁门乡民生活方式的变迁存在地理上的差异。“祁田高亢快牛剌不得用入甚薄，岁稞粉蕨葛佐食，故乡民趋重在农，天将曙举家爨火，致力于山场。此外，植茶为大宗，东乡绿茶得利最厚，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浚、汉、沪港等处。”<sup>[2]P601</sup>而西南两乡务农者，约占十分之七，士、工、商仅占十分之三，多藉茶为生活，营商远地者，除茶商而外，寥寥无几。东北城三区，则农居十分之四，商居十分之四，士、工、商仅占十分之二。五乡比较，

生计西南较胜。<sup>[5]</sup>西南两乡因为茶业最盛，其社会变迁最为显著。如西乡历口，“近日业茶获利者，屋宇亦多壮丽。”<sup>[2]P603</sup>

### (五) 茶文化

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且在茶叶生产制造的过程中还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丰富多彩的茶文化。茶诗、采茶歌、采茶戏等具有地方性的茶文化进一步丰富了民众的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 (1) 茶诗

唐宋时期，祁门就因产茶而闻名于世，祁门咏茶诗产生也较早。宋代祁门籍著名词人方岳曾作《山居》一首来赞美家乡的茶叶：“我爱山居好，红绸处处花。山粘居士屐，藤覆野人家。入馔春烧笋，分灯夜作茶。无人工襟袍，烟雨话桑麻。”近代以降，随着祁红问世，贸易日盛，祁门的茶业经济空前繁荣，赞美祁门茶叶的茶诗更多。祁门红茶独步世界市场，主要原因就是其具有一格的“祁门香”的品质。许承尧曾《谢玉田馈祁门茶》的诗文中赞美祁门红茶，诗文曰：“黄山之茶绝清俊，如苦吟客兼甘辛。龙井乃如病西子，天然秀逸美在颦。祁门红茶更何似？浑金璞玉羲皇民。不矜不伐不峭厉，外若淡泊中含纯。涤羶黜积称最好，亦解避暑湔埃尘。”<sup>[6]P216</sup>祁门西乡高塘是红茶主要产区之一，民国时期，胡光钊曾对《高塘》一诗中称赞该地的茶叶：“春曾深山雨尚塞，棉衣犹怯五更翠。鸢鸢岂管茶芽壮，也盼晴曦晒羽翰。”<sup>[7]P233</sup>祁门东乡“四大名家”是“屯绿”中的上品，程以人在作诗赞其品质，曰：“鳧绿洲茶别样清，一杯忽动故园情。玉川健笔谁能继，但觉清风习习生。”<sup>[7]P234</sup>还有一些反映茶采摘和制作的诗歌。《茶声》中保存了一些采茶诗。如采茶诗有四首，“依家家住乌泥关，每到春来便不闲。最是清明微雨后，朝朝早起上茶山。”

“茶山到处是茶丛，三月风光鸟语和。纵有莺莺声百嘈，多情不及采茶歌。”“采茶歌里日出长，倦系茶叶笑语郎。采得新茶归去后，阿农要做新农裳。”“新农未必着农身，十指铁潢泡已匀。为解人间饥饿渴苦，年年反苦采茶人。”<sup>[8]P99</sup> 采茶诗反映了茶叶采摘过程中采茶女的精神风貌。另外，还有四首反映茶叶制作的诗歌，“三间小屋带厨房，姊妹灯前笑语狂。采得嫩芽连夜制，明朝挑去上茶庄。”“火吐红焰炽铁锅，新茶把把细揉捻。但求色味堪清赏，一任汗水似雨多。”“为焙佳茗苦难干，夜已深兮漏已残。倦眼欲睡睡觉不得，茶簾尚待细翻看。”“雀舌烹来香更清，诚然两腋似风生。伊谁解识制茶苦，陆羽卢仝浪得名。”<sup>[8]P99</sup> 从中我们可以窥视当时茶叶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工序。

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屯溪茶叶改良场为试制红茶，征集了《红茶好》的诗歌四首，刊登在《安徽茶讯》杂志中，编者有按语曰：“本文系该场应特约茶园永植农林场之约“试制红茶”所编。印发茶农，以示倡导。故而文体词韵，力求通俗。”现录如下：

红茶好，制法妙！采得嫩，长得速，一芽二叶括括叫。寻常摘两回，今儿采三交，采叶计量多几挑！

红茶好，制法妙！第一步，行萎凋，日晒风干都便当。叶软似蛾眉，搓揉卷成条，千根万条一样娇。

红茶好，制法妙！搓揉紧。发酵速，叶色红似大红袍。香醇味尤美，发酵工夫到，烘干后又变黑了。

红茶好，制法妙！行干燥，要两交（一次曰毛火，一次曰足火。）调理不周会竣焦。开水冲泡过，还是大红袍，红茶真好真巧妙！<sup>[9]</sup>

这四首诗，分别反映了红茶采摘和初制过程中的萎凋、揉捻和干燥几道工序，语言

质朴、形象生动。有关祁门茶叶的诗歌还有很多，它反映了当时祁门茶叶繁盛景象和茶叶产制的具体情景。

## （2）采茶歌与采茶戏

采茶歌和采茶戏是祁门广大劳动人们在茶叶生产过程实践中形成和创造的，是对茶农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20世纪30年代流传于祁门红茶区的一首山歌写道：

三月抬得采茶娘，四月抬得焙茶工。千箱捆载百舸运，红到汉口绿到吴中。年年贩茶赚价贱，茶户艰难无人见。雪中茗草雨中采，千团不值一匹绢。钱小秤大价半赊，口唤卖茶泪先咽。<sup>[7]P253</sup>

这首山歌内涵丰富，值得玩味。“三月抬得采茶娘，四月抬得焙茶工”，是对茶叶采制过程的反映。“千箱捆载百舸运，红到汉口绿到吴中”说的是，茶叶制成后，通过水路运输到茶埠，红茶运往汉口，绿茶运往苏州销售。“年年贩茶赚价贱，茶户艰难无人见。雪中茗草雨中采，千团不值一匹绢。钱小秤大价半赊，口唤卖茶泪先咽”数句是说，茶叶交易中茶商压低茶价，茶农遭受茶商的沉重剥削，生活极为贫困的现实情况。

茶农在生产的过程中，将采茶歌与民间戏剧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采茶戏。傩戏和目连戏是祁门最具特色的民间戏剧，随着茶业经济对农民生活影响的加深，茶文化也逐渐融入傩戏和目连戏之中。傩戏和目连戏的演员大多是来自乡村的茶农，他们农忙之时种茶、制茶，闲暇之时演出。而演出的开支，诸如行头添置、伙食杂费等，也离不开茶叶收入。过去祁门有句老话：“一年目连三年熟”，就是说三年的收入才能演得起一场目连戏。祁门茶业改良场在采茶戏的创造和推广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7年，胡浩川场长，带领茶业改良场的一班人，撰写了题为《祁门红茶》的剧本，详细地述说了祁红生叶采摘、初制和精制的各个过程，

出演后引起极大反响。1949 年,为庆祝祁门解放,将原剧本加以改造,添加一些新的内容,改编为《天下红茶祁门好》的六幕歌剧,进行演出,是对祁门茶业戏剧的集中展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sup>[7]P255-258</sup>

祁门的茶诗、采茶歌和采茶戏,多是在近代祁门茶业经济崛起之后才大量产生的,是对当时茶叶产制的集中反映,在一定程度上也极大丰富的广大农民的社会生活,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综上所述,晚清民国时期,由祁门茶叶外销兴盛,茶业成为祁门县的经济支柱,祁门茶商在将家乡茶叶源源不断的运送到通商口岸销售的同时,又将那些大城市新兴的思想、文化、习俗和洋货等带到故里,引起了祁门乡村社会社会风貌的变迁,使得穷乡僻壤的祁门乡村社会的积极进入了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茶叶利润源源不断的流入祁门乡村,使得民众的生活方式发生新的变化,使得报刊和邮局等现代传媒获得发展,服饰日趋奢华,民居建筑向实用化演变,宗教和民间信仰兴起。茶农在生产实践中还创造出了采茶歌、采茶戏等艺术形式,这些民间艺术极大地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祁门近代社会的变迁过多的依赖于茶业经济的发展,因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随着中国华

茶对外贸易的衰落,祁门茶叶贸易也日益衰败下去,祁门县失去了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延缓,乃至趋于停滞。

### 参考文献:

- [1] 李家骥. 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 [M]. 民国铅印本.
- [2] 刘汝骥. 陶甃公牍 [M] // 官箴书集成, 第 10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601.
- [3] 张维. 祁红茶产制运销改进意见书 [J]. 经济旬刊, 1936 (13、14): 103.
- [4] 张宗成, 严庚雪. 祁门红茶区近况 [J]. 实业部月刊, 1936 (8): 134.
- [5]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 [J]. 1914 (4): 6.
- [2] 刘汝骥. 陶甃公牍 [M] // 官箴书集成, 第 10 册, 合肥: 黄山书社, 1997: 603.
- [6] 许承尧. 疑庵诗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0: 第 216.
- [7] 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祁门文史 [M]. 第 5 辑, 2002.
- [8] 制茶诗四首 [J]. 茶声, 1939 (8): 99.
- [9] 屯溪茶业改良场. 红茶好 [J]. 安徽茶讯, 1941 (3): 45.

##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a Economy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Modern Qimen

Kang Jia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r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tea economy in Qimen County had developed unprecedentedly because local businessmen generally operated the tea trade. With the rise of tea industry,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had happened on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custom of Qimen which accelerated the social transition. The flourish of tea

trade also stimulated the rise of some villages, including people's costume and villages' architecture. The tea peasants had also created new artistic styles of songs and dramas reflecting tea leaves picking, which greatly enriched the local's daily lives. After the 1940s, as the decadency of tea trade, Qimen lost its economic base for development, which had significantly delayed social transition and even caused stagnation in Qimen County.

**Key Words:** Modern Times, Tea Economy, Qimen County, Social Transition.

[作者简介] 康健 (1984—), 男, 安徽祁门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明清史和徽学研究。